
November 2021

The Paradigm,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of “New World Literature”

Lan H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Hao, Lan. 2021. "The Paradigm,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of “New World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6): pp.148-15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6/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新世界文学”的范式特征及局限

郝 岚

摘要: 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世界文学”理论显现出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根本改变:它不再是稳定的、本质主义的,而是关系的、网络的,是过程性的“发生”;其认识论的“单元观念”不再是民族和语言,不是二元的,而是多元的、更加关注作为现象学的翻译研究;由于人文学科研究中“语文学的破产”,以及世界文学文本的日趋庞杂,研究者提倡合作、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数字人文的兴起在方法论上解决文本过剩的问题。虽然“新世界文学”理论面临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但却形成了新的比较文学研究共同体,凸显本学科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 新世界文学; 范式;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局限

作者简介: 郝岚,博士,天津师范大学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文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世界文学理论。通讯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3 号文学院,300387。邮箱:haolan73@qq.com。

Title: The Paradigm,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of “New World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saw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theory of new world literature. It is no longer stable and essentialist, but turns into a relationship, a network and a process of occurrence. Its epistemology is no longer dualistic, but pluralistic,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ity and language to emphasize the translated text as a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Due to “the bankruptcy of philology”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the increased complic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researchers advocate cooperation and the use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Digital humanities, in particular, emerg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solve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heir study. Although the theory of new world literature risks relativism, it has promoted a new research community with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at highlights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new world literature”; paradigm;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limitation

Author: Hao Lan,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Cross-Culture &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hilolo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heory of world literature. Address: 393 West Binshui Road, Xiqing District, Tianjin 300387, China. Email: haolan73@qq.com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热度重燃。它看似是一个旧概念,却蕴含了一种新范式,不仅折射了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危机应对,也反映了人文学科重要的观念变化。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裔比较文学学者谢平(Pheng Cheah,也译谢永平)在其专著《何为一个世界?——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第一章标题所言,这已经是一种“新世界文学”(The New World Literature),因为“在过去 20 年里,全球化的加剧导致文学研究重新创造了比较文学学科与世界文学子

领域的争论,它是以伦理上对文化差异和当代地缘政治复杂性的敏感为形式的”(Cheah 184)。尽管谢平从后殖民角度展开论题仍有可商讨之处,但是他对全球化时代“新世界文学”的判断是准确的。

新世界文学出现的时间点,发生了一系列学术事件。杰拉尔·卡迪尔(Djelal Kadir)在 1991—1997 年担纲编辑《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①他通过发表不同国别与族裔的当代小说,将后殖民主义视角有效纳入了世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开端,艾米丽·阿普特

(Emily Apter)认为这使得新的世界文学讨论已经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和学术人文的学科聚焦点(a disciplinary rallying point)”(Emily 1)。接踵而至的是,1999年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著作《文学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 las Lettres*)的法文版出版,但真正引起世界性讨论还是在2004年它的英译本纳入萨义德主编的丛书时,书中对“世界文学空间”“文学的格林尼治”“边缘与中心”等概念的社会学讨论方法至今仍然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讨论热点;2003年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甫一面世,其“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就被广泛征引;2004年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编辑的文集《争辩世界文学》(*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中对卡萨诺瓦的书以及2000年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论文《世界文学猜想》进行了批评与讨论;2008年丹麦学者梅兹·汤姆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图绘世界文学——国际经典与翻译的文学》(*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以英文出版;2008年12月在伊斯坦布尔哈佛大学的大卫·丹穆若什教授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展开对话,由此为名“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文学”会议拉开序幕;2011年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简称IWL)在北京大学与之联合举办的首次会议上成立,该所每年暑期举办为期四周的培训项目,深化了“新世界文学”在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中的影响力……此外,紧随着国际知名学术出版社推出理论著作,著名出版社纷纷出版新的大学用书“世界文学选集”:《贝德福德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3年)、《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4年初版,2008年再版)以及《诺顿世界文学作品》(*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2年初版,2018年第四版)……他们不再冠之以“世界杰作”(World Masterpieces)。由此,“新世界文学”从理论、教学到实践,在学术共同体、大学机构和出版行业合力下,异军突起。“新世界文学”的兴起,无论对比较文学还是当代人文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因为借由它,可见20世纪末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范式转换。

众所周知,“范式”(paradigm)一词被赋予今日的学术语义,来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尽管那是一本科学哲学著作,但他的方法是历史主义的。1968年库恩在一次演讲中特别强调过:“站在这里的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一直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Kuhn, “The Relation” 3)因此,“范式”的转换对于描述人文学科关键

时期的变化也具有重要的启发。库恩的历史主义,应该与后来“新世界文学”学者对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中的历史意识和人文价值的重视联系起来;我们也应该理解,弗朗哥·莫莱蒂在他著名的图表式的宏观世界文学猜想中,引入进化论是别具深意的,因为进化论的确打破了一个神创的、凝固的、目的论的自然世界,某种意义上,进化论就是生物界的历史主义。库恩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范式”的具体定义,但在他的体系中,范式无疑就是一整套规则的制定,意味着一套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种新的观测研究对象的尺度和方向。

一、超越本体论:生成中的“新世界文学”

新世界文学的本体论改变在于:作为稳定的、本质主义的、一套由特定文本构成的“世界文学”瓦解了;新世界文学更多地指的是关系、是网络,是过程性的“发生”;它表现在对旧的经典文本的拒绝阅读或反叛,也表现在研究成果命名的动名词化或进行时态,要点在于彰显“新世界文学”的未完成、生成中的状态。

库恩认为,“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有了新范式指引,研究者就会“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库恩 101)。这句话,对理解“新世界文学”尤其有启发,因为“世界文学”看似一个旧工具,但是认识仍然有新发现,因为世界观改变了。

“世界文学”是起源于18世纪的概念,用于概括越来越丰富的、广袤的、不同民族的精神产品。歌德的前期先行者、后期追随者,用“世界文学”进行“想象”或者“命名”这个集合体,其中也蕴含了对它们彼此间的异同与联系的理解。新一代的学者,又用各自新的角度和多元的方式,让这个术语重新焕发了活力,但是它与先前的概念完全不同了,因为“新世界文学”发生了“范式”转换。

弗朗哥·莫莱蒂在他2006年的文章《进化论,世界体系,世界文学》中认为:“‘世界文学’术语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何为世界文学[……]或许,这一个术语下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世界文学:一种产生于18世纪之前,另一种比它晚些。”透过新的世界文学的范式,莫莱蒂发现了其中的秘密:“第一种世界文学是单独的马赛克(separate mosaic),由不同的‘当地’文化编织而成,有鲜明的内在多样性,常常产生新形式;(有些)进化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第二种世界文学(我更愿意称之为世界文学的体系)由国际文学市场合为一体;有一种日益扩张、数量惊人的同一性;它变化的主要机制是趋同;(有些)世界体系模式能解释这个问题。”(Moretti 120)莫莱蒂用“旧工具”透过新的世界观,发现了过去的新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旧世界文学范式与时间早晚的关系不大。1952年,德裔语文学家奥尔巴赫为纪念弗里茨·施特里希七十寿辰发表了著名的《世界文学的语文学》。文中,奥尔巴赫提醒人们,“世界文学的领域[……]是人类成员之间丰富交流的结果”,如果消除了各民族的多样性成为“标准化的世界”,“只有少数几种甚至唯一一种文学语言,那么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实现的同时又被破坏了”(奥尔巴赫 80—81)。尽管艾米丽·阿普特批评美国比较文学不应该起源于奥尔巴赫,而应该起源于同时期流亡伊斯坦布尔,主动学习了东方语言的斯皮泽(阿普特,《伊斯坦布尔,1933,全球翻译》139—152),但她的批评不足为训,因为在警惕文化霸权主义的“单一的文学文化”,鼓励世界文学的多元化、历史主义视角和人文价值上,奥尔巴赫对“世界文学”的想象,比斯皮泽用文体著作讨论、个人语言学习所证明的东西,影响要深远得多。因此“新世界文学”的研究者,在各类讨论中反复征引他,在相关文选中不断阐释他,重新发现了奥尔巴赫“世界文学”理论继承的从维柯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②

与此相对,“世界文学”若仍然只是被理解成N种固定经典文本的集合,是大师之作代表的“各民族文学的总和”,则仍然是旧范式的。即使已是1993年,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前比较文学系主任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面对已经初露端倪的“世界文学”讨论,仍充满不解,他惊叹“世界文学”是“过于宽泛的概念,让人无从说起”(Guillen 38)。2003年,丹穆若什在他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他的这位哈佛比较文学系前任主任委婉地进行了批评,他说“纪廉的反对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很难说一针见血”,就像世界上的“昆虫”这个词,你不需要被所有昆虫咬个遍,也必须承认这个词的有效性(丹穆若什 5)。纪廉还没有意识到,在“新世界文学”范式中,世界文学不再是所有民族传统经典数量庞大的集合体,不是一套符合理念的优秀的作品集,因为作为一种本体论,稳定的、本质主义的“世界文学”瓦解了。

在“新世界文学”这里,首先是对旧时代经典的反叛:莫莱蒂大胆地说,首先是不读原有的某些作品,拒绝狭窄的、细读的经典,因为仅仅严肃对待有限的极少文本,是“神学训练”,我们应该学习怎样不读它们(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126);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那里,这是一个“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它的模式“与被称作世界化(或‘全球化’)的平静模式是相反的”,它“通过否认、宣言、强力、特定革命、侵吞、文学运动等方式,最终形成世界文学”(卡萨诺瓦 6—7);柯马丁(Marting Kern)以中国的《诗经》为例,指出,“如果我们仅关注杰作,就会再次制造出自歌德起,世界文学一直在抗争的正典性(canonicity)和霸权问题”(柯马丁 30)。于是“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用新的批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125);关于它的定义也

有三重,而它最重要的是“一种阅读模式”(丹穆若什 309)。

“新世界文学”是关系、是网络、是过程性的“发生”。丹穆若什认为,“与其说这世界是一套套的作品,不如说是一个网络”(丹穆若什 4)。德国学者弗莱泽(Matthias Freise)认为,“可以用关系取代本质主义视角来观察作为现象的世界文学。我认为,世界文学必须作为一种网状关系,而非一组客观对象”,“关注其过程性”,因为“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弗莱泽 174)。

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名称,要么是将名词动词化,要么是动词进行时的,其目的无非都是要表示生成中的状态:2020年,丹穆若什在其新书《比较诸种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中,刻意将不可数的“literature”硬加了复数,足见他表达多样的文学、比较进行中的状态。该书开篇导语就祭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主席哈利·列文与他妻子1968年的一段故事,丹穆若什借此书回答列文夫人的问题——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怎样去经营比较主义者今天的贸易?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解决现在许多不同的文学在文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真正说的‘比较’(‘comparing’)到底是什么意思?”(Damrosch 1)

西奥·德汉(Theo D’Haen)2016年也有一篇文章名为《世界化世界文学》(*Worlding World Literature*),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过去的世界文学都是以欧洲为焦点的,“世界文学”必须是“同‘世界’其他文学相关联的对象”(D’Haen 14)。而丹麦学者汤姆森同样也使用了一个动名词命名自己的著作:《图绘世界文学》(*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从副标题可以看到,他要为“国际经典化和跨国文学”绘制图谱。

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哲学与概念史教授阿瑟·诺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在1929年出版的《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一书中认为,观念影响人们的“想象力和情感以及行为”,“因为对文学史的兴趣大多是作为观念运动的一种记录”,有时候它不明显,甚至文学史家也不能注意到,但它“改变了形态”,是“淡化的哲学观念”,是“被伟大的哲学观念撒播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希望发现一代人的内心思想时,我们必须考察文学,特别是在它的较为具体的形式中进行这种考察”(诺夫乔伊 17)。诺夫乔伊让我们理解,何以“新世界文学”理论的形式改变不仅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大事件,也是当代重要的哲学观念的表征,是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界思想的变化。

二、多元认识论:“语文学的破产”与翻译研究

世界文学的认识论,在于它怎样区分和建构它的知

识对象。新世界文学的认识论变化主要体现在多元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加剧，一方面无法再将语言和民族文学作为认识世界文学的“单元观念”或者最小单位；另一方面，世界文学被认为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因此，早期比较文学学者的多样语言能力在新世界文学这里，看上去减弱不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语文学的破产”^③是个危险信号。对原初文字的文本不再有本质主义的追求，因此“新世界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翻译文学，而翻译研究也不再更多地关注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差异，而是将翻译作为现象学问题来认识和理解。

从旧世界文学认识论到新世界文学认识论的变化，就是从二元到多元。作为比较文学的相关领域，新世界文学的认识论多元性，已经在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的两份报告主题中有所体现：伯恩海默 1995 年出版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及苏源熙 (Haun Saussy) 后来主持的《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2006 年出版)。经过二十年的推动，世界文学的中心对象努力突破原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既包括异质文化的非欧洲传统文学，也包括那些过去不受重视的文类或边缘群体的文学。有人批评目前英语世界中“世界文学”构想方式以欧洲小说为核心考察对象的狭隘，完全受限于类似海洋帝国模式：假设两个个体距离遥远、互相陌生、边界清晰、取代完全。除此之外，世界文学应该还有“陆地帝国模式”：“扩张得较慢，对边界的感觉也更模糊。”因此对新世界文学的多元思考在于：“如果我们赋予诗歌的传播，以及在此之下涵盖的具体诗歌、诗歌形式或体裁以特权，那么世界文学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实验性地把世界文学的领域限制在内陆民族，又会发生什么？”(苏源熙，《陆地还是海洋》115)

中国学者方维规曾批评莫莱蒂的世界文学观念，“在认识论层面基本上显示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莫莱蒂“所理解的并不是歌德的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方维规 3)。对他的后半句判断笔者表示赞同，但却对他所言的“二元”论持保留意见。莫莱蒂只是用抽象方式简化了他的论述，他的“新世界文学”认识论是多元的，“间性”、网状、动态的。因为莫莱蒂在《猜想》一文中恰恰批评了詹姆斯对柄谷行人的“二元的”批判，他使用了“三角关系”，而且强调“单一而不平等的文学体系在此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在网络，它不在文本之外：而是深深嵌入文本形式之中”(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133)。莫莱蒂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世界文学”理论家，他的观念是极佳样本，特别是他的方法论更新，更为人文学科带来了新气象，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讨论他。

诺夫乔伊提示我们，“在处理各种哲学学说的历史时……把它们分解成它们的组成成分，即分解成可称为单元——观念 (unite-ideas) 的东西”(诺夫乔伊 1)，这样

有利于看清它们的组成。“语言”“民族”，就是早期“世界文学”的“单元观念”。汤普森 (Mads Rosendahl Thomsen) 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2017 年报告中谈到比较文学的新世界文学转向：“向世界文学的转变是有意义的，它强调了多种语言阅读的意愿，并呼吁以一种较少依赖民族框架的方式思考比较的新方法[……]没有一个公认的世界文学，但有许多方法可以使这些差异发挥作用[……]这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④ (Thomsen, “World Famous, Locally” 119)

美国当代著名梵语和南亚语文学家谢尔登·波洛克 (Sheldon Pollock) 在重新阐发古老语文学的价值和精神方面，功劳卓著。他曾在 2010 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ACLA) 新奥尔良会议上作为特邀嘉宾发言，题为《世界主义的比较》(Cosmopolitan Comparison)：他批评比较文学专家的多语种能力和语文学素养在减弱，他用数据说明，美国绝大多数文学研究都是 1800 年至 1960 年的英语、法语和德国文学研究，研究和边缘的、古老的、东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少，“比较文学会失去文学，某种意义上正在失去，因为我们失去了语言的途径。”苏源熙在 2017 年出版的美 国比较文学十年报告中撰文《比较文学：下一个十年》，其中谈到波洛克以上对比较文学的“责骂” (scolding)，指出：“以翻译为主的世界文学，通过放宽语言要求和相应的文化信息，来适应新的秩序” (Saussy 26)。新世界文学在语文学上的崩塌、多语种能力的丧失，正在于在新范式下的认识论的多元，不再执着和迷恋原语言的文本魅力，这当然是值得警醒的。

诺夫乔伊认为比较文学与观念史一样，表达了“由于各种民族和语言造成的对文学以及别的历史研究的传统划分所产生的各种结论的抗议”；在文学史研究上，依据语言分科是“认识到专门化之必要性的最好方式，而这却远非是自明的。现存的划分的图式部分地说是种历史的偶然事件，是大多数外国文学教授基本上作为语言学大师这种时代的一种遗风。一旦文学的历史研究被设想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关于因果过程的研究——甚至是某种关于故事迁移的相当琐碎的研究时，它就必定会不再顾及这种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了，因为没有比不顾那些界限而去研究大部分过程更为确定的了”(诺夫乔伊 18)。诺夫乔伊所言，指的正是现代大学制度中，院系设置多数依据语种设立了民族语言文学系，这也是早期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需要多语种能力、要跨越国别文学的语文学制度化的基础。

语文学 (Philology) 来源于希腊语，意思为“爱语言”，它专注于用原语言对文本进行阅读、分析与批评。在世界文学研究的旧范式里，以语言为核心的语文学对人文学科，如同牛顿的数学对自然科学，是基本的方法论。过去的“世界文学”，无论其定义如何，都需要阐释它与“民族文学” (national literature) 的关系。世界文学的基本划

分单位,是由语言区分的民族文学,因为从赫尔德开始,“民族语言”构成相互平等的、各自有价值的“民族文学”。它的核心是18世纪兴起的西方现代“语文学”传统。在19世纪语文学研究中,早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注重民族的正统、语言的纯粹、文化的原始和“纯真”状态,因此构拟了“原始印欧语系”“雅利安童年”。在此之后,比较语文学被纳粹分子、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利用,这一构拟被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被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中进行了抽丝剥茧的批判,语文学开始变得臭名昭著。但新世纪西方人文学界有一个“回归语文学”的热潮(沈卫荣 39—42),令文学研究界在理论热之后,重新思考回归原语言和文本的价值。

早期的世界文学,基本的“单元”是“民族语言”“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学者的看家本领,本来就是多语种的语文学的功力,对世界文学早期研究者基本的学术要求便是具有多种语言能力,他们多是基于欧洲语言特别是罗曼语专长的语文学者,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占据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界的主流:如同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斯皮泽,他们注重语言、修辞和文体的研究。用今天的眼光批判性考察,起源于18世纪的“世界文学”无论如何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一系列研究。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犀利地指出,连歌德采用的也是“帝国主义式的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她说这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所称的“布鲁姆斯伯利小团体”(Blomsbury Fraction)没区别(Damrosch and Spivak 472)。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与深入,“语言”“民族”都不再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因此表现出跨界、混杂的特性;过去拘泥于使用一种纯粹语言作文学分类的方法也不再有效,于是出现了“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华语系(Sinophone)等文学跨越性的重新界定与分类。新的世界文学观念打破了旧的“单元观念”——民族和语言,因此斯皮瓦克认为新世界文学的思路在“拆解旧的比较文学的局限以及国别文学的自大”方面非常有效(Damrosch and Spivak 477)。

由于对源语文本语言不再有“神学”的崇拜,“新世界文学”尤其注意翻译问题:劳伦斯·韦努蒂掷地有声地说,“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界定[……]所谓世界文学与其说是原文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还不如说是翻译过来的作品”,同样,“翻译深化了当前世界文学的概念”(劳伦斯·韦努蒂 203—204)。由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旧范式是二元论的,在二元世界里,优秀学者必须阅读源语文本,但是当认识论变得多元时,每一个译本的价值无需完全依附在源语文本上,它是自足的,这也是为什么新的翻译研究非常热爱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译作是原作的来世”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为翻译研究这个“比

较文学的穷亲戚”翻案的时间,与“新世界文学”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是同步的,巴斯奈特振聋发聩地指出“应当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看作一个有价值但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巴斯奈特 157—185),恰恰是因为她敏锐感知到了范式的变化,虽然她所言的翻译研究并未“反客为主”,但是的确通过比较文学的学科增长点——“新世界文学”——获得了更多关注,从而进入了新世纪更广阔的天地。

过去我们认为,范式转换改变的只是研究者对观察的诠释而已,而观察本身却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库恩却引用了当时流行的格式塔视错觉现象解释说,无论是观察行为本身、观察所得数据,以及对数据和现象的解释,其实都变化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始自笛卡儿,并与牛顿力学同时发展的哲学范式的一个基本部分[……]今天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甚至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都显示出这个传统范式不知怎么出了问题”(库恩 110)。牛顿凭借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建立了一套数学语言解释这个世界,工具就是实验和数据,这完全改变了过去使用思辨解释自然的方式。由此,近代科学产生了,自然哲学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哲学自此与科学分了家,“沦落”为人文学科。笛卡尔推崇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论,关注主体的“自我”,崇尚理性和科学进步观,认同数学方法对世界和自然的解释。数学方法对于自然科学,就如同语言对于文学,都是该学科认识知识对象的最基本单位。牛顿和笛卡尔哲学有着很多差异,但是对理性和确定性的坚信,都让我们关注到,他们思想的底色是一致的线性因果论和决定论。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与深入,不仅“语言”无法分类和涵盖所有文学,连“民族”都不再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因此对“新世界文学”的认知出现了许多新的“单元观念”,如性别、族裔、流散……在特征上,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新世界文学开始关注多元化、跨界性、混杂性、不可译性等问题。当语言代表的“民族文学”消散,将“翻译”视为现象学本体的“新世界文学”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些变化不过是与“新世界文学”本体论的非本质主义相匹配的,这和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中的非确定性和非决定论一脉相承。

三、跨学科方法论:“远读”与数字人文

如果“回到世界文学这个古老的抱负”,关键在于“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怎么做”(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124)。这提出的就是新世界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库恩坦言:“给定范式之后,探究这一范式的事业的中心就是数据的诠释。”(库恩 111)新世界文学方法论的变化首先是在承认每个个体语言能力有限基础上的合作模式;其次是借助周边科学的研究方法,采用“大尺度”,识

别世界文学的图谱。新世界文学除去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以外,也广泛使用来自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⑤等的方法。其中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对于“新世界文学”不仅是认识论,更是方法论,在文本和各类数据上,世界文学可以被认知的部分都大幅度增加了。我们可见方法上的变化,就在于线性的、二维的、结构化的细读,到交叉的、多维的、非结构化“远读”。

本体论、认识论上的变化,加之信息技术的变化,使得新世界文学研究者纷纷开始承认文本的过剩,或者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处理世界文学的信息过载。丹穆若什在他的《什么是世界文学?》结语部分,借用了英国17世纪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 1621-1678年)《致羞怯的情人》中的开头诗句“如果有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来表达读者面对文本时的无奈;莫莱蒂切实地说,不用说世界文学,即使仅仅是英国19世纪经典小说,也不会有人全读过,因此读得多不是办法,他提出的是距离阅读,在这里,“距离是一种知识状态:它让我们着眼于比文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而“少即是多”,因为虽然从整体上理解体系必须接受会损失一些东西,为理论知识付一些代价,但是唯有如此,才能看清楚,了解它(《世界文学猜想》125—127)。

由于认识到世界文学的庞大、多元和复杂性,这一批研究者都提倡合作,“没有集体合作,世界文学将始终是个海市蜃楼”(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续篇)》137)。在对抗新世界文学的语文学破产方面,丹穆若什认为世界文学研究者应该学习更多的语言,超越国别文学系里那些研究者,在掌握更多语言的基础上,通过“加入高值文学理论的文化资本”来超越那些国别文学研究者狭窄的知识范畴;在方法论上,“对世界文学的追求[……]需要更多的学术合作以及教学合作[……]我们必须严肃看待在多种语言中,我们超越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有限能力这一问题。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合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正着力奉行这一原则的大多数社会科学”^⑥。这意味着,新世界文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合作和跨越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3年度的报告中,苏源熙开篇就使用“蜂房”的比喻提醒比较文学不要过于慷慨,导致我们惠及他学科,却忘记了“自私的基因”从而丢失了自我;他同时也注意到信息时代的变化:“细节重于一切的文本细读和似是而非的传统文学批评一定是过去信息贫乏的交际的症状[……]阅读当代以前的文学就是一次进入完全不同认识论世界的旅行。”(苏源熙48)弗朗哥·莫莱蒂多次使用图表、拓扑学,达尔文进化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树状结构和波浪隐喻,描述现代小说在不同地域的发展面貌。

《纽约时报》曾有书评评价弗朗哥·莫莱蒂的研究:

“阅读莫莱蒂,无法不注意到他在为(文学研究)争取科学的地位。他如同文学领域的林奈——分类处理一大堆新的数据,又似乎是维萨里——揭示出文学史的基本框架,然后现身伽利略——说明并重整了整个书籍宇宙的秩序,时而又成为达尔文——探寻‘文学进化的法则’。”(Schulz, “What is Distant Reading”)这里要说明的是,“新世界文学”理论与生物进化说的模式相关,其原因,不仅是方法论的,更在于他的方法论的世界观底色是历史主义的,也是非目的论的。莫莱蒂所说的“进化”观念来自达尔文,这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虽然在达尔文之前的拉马克、钱伯斯、斯宾塞和德国自然哲学家的理论都已经逐渐发现和使用“进化”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进化观是有目的的——动植物的“理念”早已存在——也许是在上帝心中——因此整个进化过程都是向这个“目的”和“理念”前进演化的,大多数时候,它都是“善”的,“好”的。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承认任何上帝或自然设定的、既成的目的,这种“非目的论的进化观”是随机的,没有必定的“善的”目的,是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因此,我们会看到,莫莱蒂用“新世界文学”范式重新考察历史,他对现代小说的世界进化的描述,也是现象学的,认为这是历史偶然性的、随机的,是适者生存的,与这种文学和形式是否“好”无关,这也就是美籍学者谢平所说的,出于伦理上对多元化的敏感,我们应对过去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文学体系提出批判。

人类学家贾姆希德·特赫兰尼(Jamshid Tehrani)在他的研究中用数字人文的网络分析,基于种系发生学重建(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的方法研究了古老的小红帽故事,分析了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58个小红帽故事。结论是该故事主要是三个类型:欧洲类型(含有一个受害人和狼)、非洲类型和亚洲类型(多个受害人和狼)、东亚类型(多个受害人和老虎)。最终证明,该故事的源头并非一个,而是多个。那么还坚持唯一起源的老观点是否还有意义?(Tehrani Alexander, “The Phylogeny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9-10.)这个例子证明,运用新方法,新世界文学研究者基于多元认识论,证明了一个与旧的世界观不同的故事起源。

在“新世界文学”的研究结构中,不再是二维的时间和空间的结构化分析,而是多元交叉的非结构化分析。这也顺应了大数据时代的非结构化特征——各类信息和文学现象交叉、互渗,彼此补充。大数据时代的技术的改变,很大意义上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变革,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的储存、汇集、搜索,借助新方法都成为可能。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多形态数据,对应文学,便是因分类标准、衡量尺度不同,对新世界文学的认识不同。

余论

“范式转换”是由于旧的“范式”不再能解释一系列的反常现象,而“科学共同体”要在“范式转换”中达成共识,必须有“相同的模型”,使得“共有范式”成为“一个基本单位”,通过学校教育,来培育新的“共同体”(库恩 10)。

2004年,斯皮瓦克在她的《一门学科之死》中谈到“全球化”的例子,非常清晰表明了何为新范式的认识论,就是“在电子资本的方格中,我们实现了将那抽象的球用经线和纬线彻底地覆盖,同时,还用一些虚拟的线条将其拦腰斩断。那里曾一度绘着的是赤道、北回归线以及诸类如此的线条,如今,这些已经被地理信息系统的要求所占据”,她建议用星球(Planetary)来称呼这个集合体,“运用一种未经经验的环境主义论,联系到一种未经分割的‘自然空间’,而非一个分化了的政治空间”,星球是“他异性(alterity)的类型,它属于另一种体系。尽管我们居住在它的上面,但那只是借住”(斯皮瓦克 90)。斯皮瓦克的“星球”文学同样是出于对全球化时代,对变化中的、世界上的文学研究一个集合性的概括,但最终未能获得知识共同体的“共识”。她不像丹穆若什,后者通过专著澄清“什么是世界文学”,主编大学课本将过去的《世界杰作选》(masterpieces)改为《世界文学选集》以对抗过去的西方中心论,实践多元文化观;又通过制度化的“世界文学研究所”(IWL),每年暑期用四周时间向全球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推广这一概念……总之,透过文学社会学的分析,我们发现“新世界文学”这一范式的转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共同体”的关注和讨论,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章法可循的。

需要澄清的是,范式转换,并非新的就比旧的好,它不是“进步主义”的——新旧范式之间,不是优劣之别,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使同样的词汇,含义也截然不同,并非因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真”,而是因为世界观的转变。库恩认为在范式转换和革命之中,新的思想和概念无法与旧的思想 and 概念严格比较,形成“不可通约性”(库恩,《科学结构的革命》134)。因此,即使都是面对同一历史时期、同一批次的文化交流现象,世界文学的理解要点也各有不同,这并非对错之分、好坏之别,因为不存在一个能适用所有领域和现象的观察范式,每一种理论,包括“新世界文学”,都如同一束光,只是照亮某一块区域。但换个角度说,我们应该思考:这难道没有“相对主义”之虞?

没有理论是完美的,对新世界文学的批评并不鲜见。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的论文《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文学体系的类型学》,旨在回应莫莱蒂和卡萨诺瓦的观点。他认为莫莱蒂过于依赖自己所擅长的小说研究,而小说只是文学的一部分;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

共和国》则存在历时和空间上的局限(Beecroft 87)。阿普特干脆从“不可译性”发出挑战,书的名字就叫《反对世界文学》(*Against World Literature*),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导论里批评新晋的世界文学的复兴,似乎“都假设了文学的可译性,却没有考虑充分文学阐释的不可通约性亦即不可译性”(Apter 3)。其中“不可通约性”,阿普特使用的是“incommensurability”,正是库恩在《结构》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因此范式转换不一定是通往单一真理,而是追求恰当的世界观念,用于解释变动的领域。库恩后来在回应针对该书的质疑答辩文章中谈到,“不可通约性”是“从数学中借用来的术语:在数学中,它并没有这种含义。等边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它的边是不可通约的,但是它们可以在所要求的任何精确度上进行比较。缺少的不是可比较性,而是一个可对它们进行直接和精确度量的长度单位。在把‘不可通约性’这个术语用于理论时,我的意思只是坚持说,能将两个理论完全表达出来,并因而可用在它们之间作出逐点比较的共同语言是没有的”(Kuhn, “Theory-change” 191)。库恩还指出,不可通约性的意思是“没有共同的量度”。将这个术语用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说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没有一组中性的标准可对理论的相对优劣作出一致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说对科学理论无法进行比较。把不可通约性混同于不可比较性是种严重的误解。

就像人们对库恩的批评,新世界文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的文学都摆上世界文学的“圆桌”,知识阶层拒绝作出价值判断,坚决不告诉读者哪些更好、文体上更完善、技巧上更成熟,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世界文学”,也带着多元文化主义的“肤浅”和相对主义的弊端(Spivak 183)。宾州大学的德扎拉·卡迪尔(Djela Kadir)早在2003年美国比较文学报告中,就写了题为《恐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一文,其中就提醒十年以后的报告将面对的越来越突出的“世界文学”讨论。^⑦他说:“从全世界的文学想象世界文学(莫莱蒂、丹穆若什等)、全球文学(第莫克、史书美)、星球文学(斯皮瓦克)的转化之简便确实令人生畏。构建世界文学名著的历史时刻,也就是当历史的密度在后差异的舒适地带被稀释,文化的情境特殊性成为本土文化主义学术讨论话题(我指的是出于对本质主义的恐惧感,或担心消散于普遍主义之中,而将差异再次人类学化为‘不可触的’)。”(卡迪尔 94—95)如今,距离卡迪尔预言发生的2013年都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事实证明,他说的部分是正确的,新世界文学的确面临了这样的两难。

尽管有各种批评的声音,新世界文学的意义还是巨大的,不仅是在范式意义上,还有让我们看到比较文学“学科之死”后,“新世界文学”已经成为翻新乏术的比较文学新的学术增长点。毕竟,学者们求同存异的讨论、对共同理论问题的关注,让分裂的世界重新有了对话的

可能。

要形成一个新的学术范式,需要致力于阐释、重审当今世界文学现象的研究者在学术活动中结合成“和而不同”的共同体,这比单纯争论概念、将学科疆界画地为牢更有意义。不过值得警惕的是,“新世界文学”不能重新沦为另一类“理论热”,它还需要真正的多语种、多焦点、扎实、切实的文本分析实践,而不单纯只是讨论它的理论模型与可能,或者是停留在“图绘”“形塑”与“猜想”阶段。这其中,中国学者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追随国际学者的脚步,更需要有分量、有特色的研究来重释、补充,或者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提供另外的模型与可能!

注释[Notes]

- ① 《今日世界文学》(*Word Literature Today*)是英语世界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份世界文学类杂志,1927年创办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该杂志主要刊登各语种的当代文学作品英译和评论。该杂志每两年一届评选“诺斯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Prize),甚至有“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之称;每年举行“普特博学术研讨会”(Puterbaugh),这两项活动在世界文学界都有一定影响。
- ② 关于奥尔巴赫在美国比较文学中的多重引述和复杂影响,参见郝岚:《被引用的奥尔巴赫——〈摹仿论〉的比较文学意义》,《外国文学研究》37.3(2015): 34—39。
- ③ 该词来自2011年大卫·丹穆若什与斯皮瓦克对话中所谈到的当今世界文学面临的三个问题之一,其他两个问题是文化上的灭绝、与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合流。参见 Damrosch, David and Gayatri Spivak, “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 A Discussion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David Damros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8.4(2011): 455—485.
- ④ 汤普森继续了他在《图绘世界文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对世界文学的地方性、世界声名进行了分析。本处引文参见 Mads R. Thomsen. “World Famous, Locally: Insights from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 Ed. Ursula K. He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19.
- ⑤ 该概念来自2009年2月,以 David Lazer 为首的15位学者在《学科》(Science)上发表题为“计算社会科学”的观点性文章,2014年Springer出版 Claudio Cioffi-Revilla 所著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一书,中文参见朱萌 龚为纲:《计算社会科学:一种新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8日第5版。
- ⑥ 该文有中译:大卫·达姆罗什 斯皮瓦克:《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斯皮瓦克和大卫·达姆罗什的一次讨论》,李树春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2年第2期。但是由

于在一些关键词句的理解上有异议,特别是该中译删减了不少斯皮瓦克谈及巴赫、马克思和对歌德的批评,因此本文引自英文出处。

⑦ 2017年,这个报告的英文本已经出版,但为何比较文学界对它反应不热烈,或值得专题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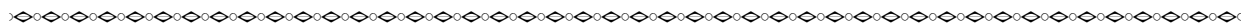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伊斯坦布尔,1933,全球翻译》,莫亚萍、张晓华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1(2013): 139—152。
- [---. “Global Translation: 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tanbul, 1933.” Trans. Mo Yaping and Zhang Xiaohu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1(2013): 139—152.]
- 艾里希·奥尔巴赫:《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79—89。
- [Auerbach, Eri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Eds. David Damrosch, Liu Hongtao and Yin X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79—89.]
- 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查明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rans. Zha Mingj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Beecroft, Alexander. “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a Hyphen: Towards a Typology of Literary Systems.” *New Left Review* 54(2008): 87—100.
-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的共和国》,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Casanova, Pascale.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Luo Guoxiang, Chen Xinli and Zhao N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Cheah, Pheng.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Damrosch, David.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Trans. Zha Mingjian and Song Mingwei,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Damrosch, David, and Gayatri Spivak. “Comparative

-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 A Discussion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David Damros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8.4(2011): 455-485.
- D'Haen, Theo. "Worlding World Literature." *Recherches littéraires/Literary Research* 32(2016): 7-23.
- 方维规:《叙言:何谓世界文学?》,《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世界文学》,方维规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Fang, Weigui. "Preface: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Ideas and Methods: World Literature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Universal*. Ed. Fang Weig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马蒂亚斯·弗莱泽:《世界文学的四个角度——读者,作者,文本,系统》,张帆译,《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世界文学》,方维规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74—185。
- [Freise, Matthias. "Four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Reader, Producer, Text and System." Trans. Zhang Fan. *Ideas and Methods: World Literature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Universal*. Ed. Fang Weig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74-185.]
- Guillén, Claudio.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德扎拉·卡迪尔:《恐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苏源熙主编,任一鸣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6—96。
- [Kadir, Djel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Terror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Haun Saussy. Trans. Ren Yiming,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86-96.]
- 柯马丁:《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由张隆溪教授的演讲所想到的》,韩潇怡译,《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世界文学》,方维规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28—32。
- [Kern, Martin. "Who Decides the United Nations of Great Books?" Trans. Han Xiaoyi. *Ideas and Methods: World Literature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Universal*. Ed. Fang Weig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28-32.]
- Kuhn, Thomas S. "Theory-change as Structure-change: Comments on the Sneed Formalism." *Erkenntnis* 10.2 (1976): 179-199.
- .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3-20.
- :《科学结构的革命》,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rans. Jin Wulun and Hu Xinh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阿瑟·O·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 [Lovejoy, Arthur O.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n an Idea*. Trans. Zhang Chuanyou and Gao Bingjiang. Jiangxi: Jiangxi Education Press, 2002.]
- Moretti, Franco. "Evolution, World-Systems, Weltliteratur." *Studying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 Ed. Gunilla Lindberg-Wada. Berlin: De Gruyter, 2006. 113-121.
- :《世界文学猜想》,《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3—135。
- [---.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Eds. David Damrosch, Liu Hongtao and Yin X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3-135.]
- :《世界文学猜想(续篇)》,《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36—142。
- [---. "More Conjectures."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Eds. David Damrosch, Liu Hongtao and Yin X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6-142.]
- Saussy, Hau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Next Ten Years." *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 Ed. Ursula K. He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4-29.
- :《陆地还是海洋:论世界文学的两种模式》,曲慧钰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21): 110—115,122。
- [---. "By Land or Sea: Models of World Literature." Trans. Qu Huiyu.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2021): 110-115, 122.]
- :《新鲜噩梦缝制的精致僵尸——关于文化基因、蜂房和自私的基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苏源熙编,任一鸣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53。
- [---. "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Haun Saussy. Trans. Ren Yiming,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 Press, 2015. 3 - 53.]
- Schulz, Kathryn. "What Is Distant Reading." 2011. 22 November 2020. < <http://www.nytimes.com/2011/06/26/books/review/the-mechanic-muse-what-is-distant-reading.html> >
- Sheldon, Pollock. "Cosmopolitan Comparison." April 2010. 7 December 2020. < https://shedonpollock.org/archive/pollock_cosmopolitan_2010.pdf >
- 沈卫荣:《回归语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Shen, Weirong. *Returning to Philology*.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9.]
- Spivak, Gayatri. "Teaching for the Times." *Journal of the Midwester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5. 1 (1992): 3 - 22.
- :《一门学科之死》,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Death of a Discipline*. Trans. Zhang X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Tehrani, Jamshid J., and B. R. Alexander. "The Phylogeny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PLoS ONE* 8. 11 (2013): 9 - 10.
- Thomsen, Mads Rosendahl.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 [---. "World Famous, Locally: Insights from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 Ed. Ursula K. He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19 - 124.]
- 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203—211。
[Venuti, Lawrence. "World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Eds. David Damrosch, Liu Hongtao and Yin X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3 - 211.]

(责任编辑:王嘉军)



· 书讯 ·

《大学美育》(全彩印刷)

作者:王一川主编,郭必恒副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1月

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美育直接与其人格养成有关。《大学美育》的主要特色在于从大学生人格养成方式出发阐述美育问题,目的是让美育真正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人格养成途径。大学美育指依托美学知识体系对大学生进行自然美、社会美、科技美和艺术美等审美形态养成的过程,能通过丰富多样的审美案例赏析帮助大学生导向个体美好心灵的养成,其目标在于文心涵濡。其中艺术美育问题是论述重点,具体分为中国古典型艺术美育、中国现代型艺术美育、外来型艺术美育、艺术门类美育等。此外,本书专门就网络艺术美育以及教师角色与美育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本书全彩印刷,配有教学课件,是为适应中国美育发展新趋势和新需要而编写的大学美育课程教材,既便于大学生修习,也便于学生之外的读者阅读。